

序 章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 1940 至 1970 年代的中美关系。这一时期虽不足 40 年，中美关系却经历了激烈的变化。期间，1949 年后两国长期处于断交状态，至 1972 年关系虽有所好转，正式建交却一直拖到了 1979 年。因此可以说，这是一个极不正常的时期。

因为本书的各章原来都是作为独立论文写成的，为便于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必要先简单地回顾一下各个年代中美关系的特点与问题。

1940 年代的中美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这一年代的第一阶段。1941 年 12 月美国参战，同此前独自对日抗战的中国结成盟国。由此开始，中美关系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联系，其广度与深度都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期。美军中缅印战区司令部设于中国战时首都重庆，美

国军队接连不断地开往中国^①，中缅印战区司令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将军兼任蒋介石的参谋长，美军对中国军队实施武器、装备援助，并帮助他们训练，中美军队在缅甸共同作战。美国空军也活跃于中国国土。

在经济方面，以 5 亿美元借款为代表，美国给予中国种种支援和协作对中国国民政府的财政来说，美国的经济财政援助成为不可缺少的因素。

在政治方面，美国对本属中国内政问题的国共关系进行了调停。

大战期间的美国对华政策可归纳为下述两点：其一，支援中国，以维持和加强其对日抗战；其二，促成出现一个由国民政府领导的亲美的统一的中国。特别在后一点上，寄托着美国的这样一种希望：在日本没落、苏联作为大国登场的战后东亚，由国民政府领导的亲美的统一的中国能成为美国亚洲政策的支柱。

但是，中国的现实离美国的这种愿望越来越远。

中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人民的团结和军队的英勇抵抗曾在美国得到高度评价，蒋介石作为抗日中国的最高领导而声名远扬。然而，美国参战后，派遣到中国的许多美国士兵所看到的中国的现实，远远与他们原来的想像相反：因战争而疲劳不堪的无数贫民；见到美国人就企图以高价谋取暴利的商人；腐败、无能、懒惰的官僚。如此这般的现实，使美国人蔓延起一种幻灭感。

随着战争的持续，国民政府的腐败与衰弱日益严重，因而

① 到大战结束时，驻华美军达 6 万余人（Charles F.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 China-Burma-India Theater, Times Runs Out in CBI* (Washington, D. C., Office of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Department of Army, 1959), p. 258

无法有效对付日本军队的攻势。一方面，中日战争刚开始时尚势微力弱的中国共产党却明显地在抗战中壮大起来。国民党把它视作威胁而强化了内战的冲动。人们担心是否会在抗战成功之前即陷入内战。美国政府维持中国抗战和促成中国统一的目标与时俱危。

面对这种局面，美国驻华外交官开始重新研究形势与对策。他们主张：改变无限制地支持、援助国民政府的政策；要求国民政府进行民主改革；支持中国的民主自由主义势力；接触和援助中国共产党。史迪威等人也支持他们的这些主张。但是，蒋介石对此坚决反对。二者的对立发展为 1944 年 10 月的史迪威撤职事件。其后，赫尔利（Patrick J. Hurley）担任大使。他排斥外交官们的主张，推行只支持蒋介石的政策，改善了与蒋的关系。然而，这只能使美国的政策越来越背离中国的现实（详见第二、第三章）。

1945 年 8 月大战结束。中国虽然被说成惨胜，但抗战终未崩溃，内战亦未爆发。在对外关系上，她在大战中成功地取消了不平等条约，且获得了五大国之一的地位。

但是，战争终结时中国的国土处于分裂状态：包括经济中心在内的广阔的沿海地区在日军的占领之下，国民政府退居于以重庆为战时首都的中国西南地区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以陕西省延安为据点，在西北地区和日军的占领区建立了许多解放区。

美国在大战以后也选择了深入参与中国内政的道路。首先，它为强化国民政府的力量而采取了两面政策。即：一方面，动员美军的运输机和船舶把国民政府的军队运送到沿海地区，并命令日军只向国民政府军投降，以图帮助后者尽可能多地接收日军的占领区；另一方面，由赫尔利大使居中促成蒋介石和毛泽东会谈，以图通过交涉而获得共产党的让步。结果，8 月下旬毛泽东赴重庆，实现了“重庆会谈”。10 月 10 日订立了“双十

协定”。但是，在军事方面，连中国战区的魏德迈（Albert C. Wedemeyer）司令也不能不于 11 月承认：尽管得到美军的援助，国民政府军队仍然不可能一举控制华北与东北。

接到魏德迈的这一报告后，美国政府重新研究了对华政策。结果，决定再次对国共进行调停。此时，赫尔利大使已于 11 月底辞职。12 月，杜鲁门（Harry S. Truman）总统发表声明，希望国民政府能把其基础扩大至其他党派，并表明将派遣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前往中国调停国共关系。

当时，虽然国民党内部主张以武力一举制服中共的意见很强烈，但有赖于美援的国民政府不可能轻易拒绝美国的意向。再者，反对内战的国内外舆论也很强大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把赫尔利的辞职和马歇尔的使华视作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在警戒之中寄与欢迎和期待。

在马歇尔的调停下，1946 年 1 月国共缔结了停战协定，由各党派所组成的政治协商会议亦得以召开，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与宪法草案等决议。马歇尔调停似乎取得了成功。然而，国共之间的军事纷争并未停止，尤其是在东北，因为国民政府调进了大量由美国武器装备起来的军队，企图确立对该地区的支配权，因而扩大了同他们早一步进入东北的中共军队的冲突。到夏天，终于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内战一度回国的马歇尔再次赴华，与司徒雷登（John L. Stuart）大使一起继续调停工作，却仍以失败而告终。1947 年 1 月，马歇尔回国就任国务卿。

中国共产党最初欢迎马歇尔的调停，并表现出积极合作的态度。1946 年 1 月至 2 月间的各项协定成立后，中共把它评价为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开端。但是，国共军事纷争依然逐步扩大化。中共一边照旧同意交涉，主张履行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一边则以武装斗争对付国民政府军的武力进攻。此外，对美国，中国共产党逐步加强了谴责，指出其一边推行调停国共

争端与援助国民党的两面政策，一边却在实际上支持蒋介石的内战。1946年6月22日，毛泽东发表了反对美国继续在军事上援助国民政府的声明。其后，这类谴责美国的声明不断增多。与此同时，有关美帝国主义企图统治中国、使中国成为殖民地与附属国，以及蒋介石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与卖国贼之类的评论逐步公开化（详见第四章）。

内战前期，拥有美式装备和武器的国民政府军队保持着优势。马歇尔回国时，“国民党明显地到达了他们军事成功与统治区扩张的顶峰”（《美中关系白皮书》），至1947年3月竟占领了延安。但是，实际上此时国民政府已开始陷入深刻的经济危机，招致不仅农民甚至城市市民阶层的反抗不久，在军事方面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也跌入了困境。在这种形势下，国民政府反复要求美国政府提供包括10亿美元借款在内的大规模援助。

美国政府虽然在战后也继续着对国民政府的各种军事、经济援助，而且如同“杜鲁门主义”所表明的那样，加强着其反苏反共的对外政策，但对大规模援助中国，却并不积极。其原因可举出下述几点：欧洲形势紧急，更需要大量援助；因为国民政府的腐败与衰弱日趋严重，美国认为中国如不通过自我改革而改善体质，即使予以美援也收不到实效；美国人意识到，过深地卷入中国的纷争很可能导致自己难以拔足。

与政府的态度相反，共和党的部分议员高唱积极援华论，以所谓“院外活动集团”为中心的亲国府势力亦在议会内外积极开展活动。这样，对华援助问题成为美国国内政治的一个焦点。

在这种情势下，1947年后期，美国国务院自己也开始着手计划大规模地援助中国。其原因，首先是中国形势的恶化，而比这更重要的，则是想对共和党的攻势来个先发制人，以及以援华换取共和党支持欧洲复兴援助计划（马歇尔计划）。结果，1948年4月成立了总额达4.63亿美元的“1948年中国援助法”

（详见第五章）

然而，这一援助并不能扭转中国内战的趋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自 1947 年下半年起转入攻势，1948 年 9 月至 1949 年 1 月在东北与华北取得了三大战役的胜利，1949 年 1 月进军北平，4 月横渡长江，5 月占领上海，最后于 10 月 1 日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形势如此飞速发展，美国与国民党自不待言，恐怕对共产党来说也是出人意料的。

美国政府不喜欢共党政权，但它不能不直率地承认国民党政府^①的崩溃与新政权的胜利这一确定了的事实，不能不在这一事实的基础上思考他们今后的政策。1949 年 8 月美国发表《美中关系白皮书》就是这种动向的表现。白皮书的主题是想说明：尽管有美国的援助，国民党和它的政府仍然由于他们自己的腐败堕落而自我崩溃，而对美国来说，这是无可奈何的事。通过这种解释，白皮书在把失败的责任完全推给国民党的同时，将美国 and 国民党政府区别开来，以图承认中国新政权留下余地。在这中间，还包含着对中国“铁托化”的企盼和对离间中苏关系的期待

二 对立的年代

1949 年 10 月至 1951 年的两年，是决定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重要时期。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及新政府所推行的政策，美国不得不从中国大陆完全撤退。毛泽东很早就开始考虑

^①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结束于 1948 年 5 月 20 日。因此，本书对 1948 年 5 月 20 日以前的中国政府，称之为国民政府、国民党政府或国府；在此之后的，则称之为“中华民国政府”或国民党政府。

同苏联合作，新政权一成立，即于当年 12 月访问了苏联。与此相反，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各资本主义国家，则以“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为方针，即先理清过去的关系再实行建交。对于一贯支持蒋介石政权的美国，毛泽东特别严厉，不急于和它建立外交关系。1950 年 1 月，毛在发自莫斯科的电报中指出：“美国撤退在华的一切官方人员，此事对我们极有利，惟民主人士中害恐美病者可能对我们征用外国兵营等行动有所不满，请注意解释。”^①

对美国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仅意味着其中国政策的破产，而且意味着二次大战后美国亚洲政策整个前提的崩溃。美国政府重新研究其亚洲与太平洋政策，提出了把政策的重心置于大陆外围的方针。艾奇逊（Dean Acheson）国务卿在 1950 年 1 月 12 日的演说中称：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防卫线，是由阿留申群岛连结日本本土、冲绳和菲律宾一线。这样就把台湾排除在外。随之，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政治上，日本都越来越受到重视。

对于中国，美国面临的问题是该不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对国民党政府的逃亡地台湾采取何种态度。中国新政权成立后，美国国务院立即召集学者、实业家和政治家等 24 人举行非公开的圆桌会议，讨论承认问题。大多数与会者的意见是早期承认。但是，国务院预料到这种意见会遭到国会的强烈反对，故此时不愿由自身开早期承认之端。

关于台湾，1949 年初，鉴于台湾在军事上与战略上的重要性，美国政府不愿台湾落入共产党之手，但也不相信国民党军队能在得不到美国直接军事支援的状况下守住台湾。一方面，

^① 毛泽东：《关于向民主人士解释征用外国兵营等行动的电报》（1950 年 1 月 18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北京，1987），第 241 页。

如果对中国领土台湾进行公然的军事干涉，当然难免遭到国际与国内的批判。另一方面，特别是艾奇逊国务卿担心，美国的干涉将把中国共产党完全逼人苏联阵营。因此，尽管国务院反复探讨有无不让台湾落入人民解放军之手的办法，却找不到有效的方案。或者不如说，他们更多的是在摸索：一旦台湾落入人民解放军之手，怎样才能减轻其对国内外的冲击。与此相反，以一群共和党参议员为首的势力，则攻击政府的政策，强烈要求积极援助蒋介石。

在这种状况下出台的，是 1950 年 1 月 5 日杜鲁门总统的所谓“不干涉台湾”声明。杜鲁门明言：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国际协定，台湾在日本投降后已交给蒋介石，由中国行使主权；美国无意夺取台湾，或获取其特殊权利和军事基地；美国不愿卷入中国的国内纷争，也不会对台湾提供军事援助。

对这一声明，共和党方面更加强了它的攻讦。正在此时，中国于 1 月 14 日接收了北京的美国领事馆。美国在提出抗议以后，撤回了全部外交人员，关闭了所有驻华政府机构。2 月，中苏两国订立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夸示了他们之间的团结。在这样一种形势下，要求修改台湾政策的论调逐渐在美国政府内部上升。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立即决定军事介入。27 日，杜鲁门发表声明称：朝鲜的事态是共产主义侵略的新阶段，美国决定向朝鲜派遣海空军。接着，他进一步表明：为阻止对台湾的进攻，已命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台湾地位未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平条约的缔结，或联合国的考虑”。这个声明说明，美国已决定介入台湾问题，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并改变了台湾已回归中国这一从来的立场。这是对其“不干涉台湾”声明的修正。中国将此视作对中国领土的侵略而予以强烈抨击。后来成为中美关系最大障碍的“台湾

问题”就这样产生了（详见第六章）

美军（联合国军）9月在仁川登陆，10月跨过三八线继续北进。对此，中国于10月以人民志愿军的形式参战。于是，中美双方在朝鲜半岛展开了“热战”，付出了重大的牺牲。1951年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中美之间的敌对意识极度高涨。由于中国军队的介入，美国统一朝鲜半岛的美梦破灭，不得不在三八线附近实行停战。这一现实给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带来了无从发泄的焦虑与愤懑。在美国国内，1950年2月开始掀起的“麦卡锡旋风”，由于朝鲜战争而更趋激烈。

其后，美国把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当作代表中国的正统政府而予以支持和援助；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则以联合国的“中国侵略者决议”为根据而拒绝承认，并在军事上、经济上持续实行封锁政策。中国与此针锋相对，把美帝国主义视作最大的敌人，努力结成国际反美统一战线，打破其封锁政策。这样，亚洲的冷战就以中美对立为轴心而展开

自1950年始至1972年止，是中美两国的对立与敌视时期。期间，双方虽然从1955年8月开始断断续续地举行过大使级会谈，但可以说这几乎是他们之间惟一的外交接触。大使级会谈最初在日内瓦开始，在2年多时间里举行过73次。1957年12月后一度中断，1958年9月移至华沙重开，但次数显著减少。不过，1970年，这一大使级会谈为改善中美关系提供了初步接触的场合（详见第八、第十章）。

在50年代，美国方面曾认为：中国共产党是苏联的傀儡，中国人民讨厌共产党的独裁统治以这种认识为根据，它企盼中共在中国的统治很快走入死胡同而自行瓦解。确实，朝鲜战争和美国的封锁政策对中国来说是沉重的负担。朝鲜战争所带来的人员牺牲和物质损失都很巨大，军事费用在资金上严重地

压迫了中国的经济建设。朝鲜战争以后，由于继续遭到军事的与经济的封锁，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得不走上艰难的道路。然而，尽管犯了不少实践中的错误，中国却不仅没有瓦解，反而在 60 年代成长为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

在 60 年代，一方面由于中苏对立的发展，一方面由于美国介入越南战争，亚洲的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种状况下，要求改变对华政策的主张在美国日趋强烈。但是，对美国来说，因为 50 年代留下的后遗症非常深刻，同台湾的联系也不断深入，要改变对华政策并非易事因此，直至经历越战的失败、美军的撤退成为现实课题的 70 年代，美国才终于实际谋求转变。即使如此，这一转变仍然不能不通过尼克松（Richard M. Nixon）和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秘密外交”而进行。这个事实说明了后遗症是多么严重。

在 50 年代把美国视作主敌，强调团结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自 50 年末开始与苏联对立进入 60 年代后，中国把美苏两国看成共同的敌人。到 60 年代底，它又把在边境线军事对峙的苏联，视作比正图从越南撤退的美国更大的敌人。正是在这种状况下，美国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攻势，中国也作出了相应的反应。但是，对中国来说，这意味着改变其从来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与超级大国斗争的对外政策。因此，这一外交政策上的转折与中国国内的权力斗争相联，不能不在曲折中前进（详见第十章）。

三 中国问题的国内政治化

在研究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时，特别引起笔者兴趣的，是“中国问题”在美国的国内政治化。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超出了外交政策的范围，成为美国国内政治争论的焦点

（详见第一章）。而且，在争论过程中，诸如“不忠诚”、“叛徒”和“阴谋”一类令人忌讳的词汇满天飞，给美国的政治和社会带来了黑暗的阴影。1950年以后，美国的对华封锁政策，把重大的牺牲强加于中国和他周围的国家美国严厉限制有关国家的对华贸易与交流。只要反华反共，即使是压迫人民的独裁政权，美国也予以支持。同时，在美国国内，为了确立并维持封锁中国的政策，需要形成一种以对思想、言论的统制和一律化为前提的、僵硬的中国观与中国政策观。在这一过程中，包括外交官与亚洲问题专家在内的很多人遭到压制、非难和攻击，甚至失去职位，被迫保持沉默。总之，美国的中国政策和亚洲政策，是同抑制美国社会的自由紧紧相联的（详见第九章）

上述动向的顶点是“麦卡锡旋风”它发端于1950年2月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参议员对国务院的攻击。自此，所谓“肃赤”波及政府机关、企业、大学，以及新闻界、电影界等美国社会的各个领域。这是冷战时期对意识形态的统制。在对华政策方面，同年举行了“国务院官员听证会”，翌年举行了“麦克阿瑟听证会”和“太平洋关系学会（IPR）听证会”^①。在这些听证会上，从二次大战开始至1949年为止的对华政策及其负责者和相关者均受到攻击。攻击者不是冷静地分析中国革命的过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原因，而是把共产党的胜利和国民党的失败，简单地归结到苏联的阴谋及它同美国政府内部叛变分子的“相互勾结”之上。通过这种简单的叛变论，他们使人们无法从内在因素出发客观地分析中国革命，因而严重地扭曲了美国人的中国观，促使美国建立起一种选择范围极其狭隘的、僵硬的对华政策。

“麦卡锡旋风”本身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但它留下的后遗症

① 这些听证会的正式名称，请参见第一章文献目录28、29、35

后来以各种各样的形式长期残存，起到了阻止美国改变对华政策的作用。不仅如此，在美国介入越南战争的过程中，也可发现“麦卡锡旋风”的影响。具体而言，它使人们不是从内在因素来理解越南问题，而只是一味拘泥于中苏的扩张政策这一外部原因，看不到越南的自主性与自立性；最后，它同美国的“使命感”和“对实力的迷信”相结合，陷入了干涉主义（详见第七章）。

四 关于本书的若干说明

本书共收入 10 篇论文。其中，9 篇选自笔者过去发表的有关中美关系的论文，还有 1 篇（第十章）是最近新写的。这些论文多数写于中美对立的年代。当时史料不够充分，发表的场所又各不相同，现在回头重读，感到有不少重复之处。

但是，它们是在冷战和中美对立的现实中，怀着批判和超越对立的问题意识而探索的结果。因此，我认为它们虽然存有不足之处，却至今仍有所意义。出于这种考虑，这次成书时仅对 1986 年发表的第六章作了一些修改，其他则尽量以初次发表时的原貌奉献给读者。当然，在编辑中对单纯的笔误及排版错误作了订正，并尽可能统一了文章的格式。

注释中的文献出典，因为有些资料已不在手头，故几乎都是发表时的原样。

在各章的篇末，注明了初次发表时的题目、所载杂志名称或书名，在必要的地方，还加了一点简单的说明。

凡是标有“补注”和“补”的地方，都是这次新增补的。

第一章 美国的对华政策论争： 1941~1972

一 导 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像有关对华政策的争论那样带有感情色彩的、激烈的、被重复不断议论的外交问题，可以说是很少见的。而且，在很多时候，它与其说是争论，不如说是一种单方面的压迫或威胁。同时，在这一问题上，一方面感情性的议论很多，另一方面，“负责任的、公正的议论却最少”（巴内突的证词）。结果，美国人民的中国观与中国政策观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巨大的偏差，美国的对华政策也因此而明显地趋向僵化。

进入 60 年代中叶后，要求重新研究对华政策的呼声终于在美国国内开始高涨。1966 年 3 月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了“关于中国政策的听证会”。然而，其最大的目的与其说是探讨与提出新的政策，不如说是教育与启蒙，即向国会和人民普及关于

中国的知识。这一事实证明：在这 20 多年中，堆积于美国人民之间的偏差是何等严重

本章的目的，是整理和介绍战后 20 多年来美国国内围绕对华政策的主要争论并考察其各个阶段的性质，同时希望通过这一整理和考察，能有助于人们理解美国目前所面临的国内状况

在论述中，本文为起到中美关系史研究“入门指南”的作用，将尽可能介绍与各次争论有关的主要文献。这些文献尽量限于容易到手的单行本，杂志上的论文一般均予省略。具体的文献请参照本章篇末所列“文献目录”

另外，因为本文的目的不在介绍美国的中国研究，故即使是与中国研究有关的书籍，只要它同对华政策的论争没有直接关系，都不提及。

（注：因在文章中一一标明文献的全名过于麻烦，且不易阅读，故都适当予以简称，而在其后面标明号码，请根据这些号码在章末的“文献目录”查照相应的文献。）

二 二战期间的对立

关于对华政策的公开争论，高潮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但是，二战期间发生的中国政策上的对立，不仅是这些战后争论的出发点，而且是它的主要对象。因此，在考察战后的论争之前，有必要先回顾一下战时的对立，理清其中与战后的论争直接相关的问题

二战期间的对立之一，是驻华人员在中国战线具体战略问题上的分歧它产生于美军中缅印战区司令兼蒋介石主席参谋长史迪威和美军驻华第 14 航空队司令陈纳德（Claire L. Chen-

nault) 之间。陆军中将史迪威认为：当务之急是加强中国陆军，为此先应给予部分中国军队以新式装备和训练，夺回中国军队的补给线滇缅公路；然后通过滇缅公路向中国运送军需物资，增强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向日军展开反攻据此设想，他强调缅甸作战是全局的先决条件与史相反，陈纳德认为最重要的事是加强驻华空军，在实现这一加强后，即可通过进攻驻华日军与轰炸日本本土而制服日本。对此，美国陆军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大规模的补给当前难以办到，单纯加强空军则反而会诱发日本陆军的进攻。因此，他们批判了陈纳德的战略，支持了史迪威的主张。

上述史迪威、陈纳德两人的对立，由于蒋介石的关系而更趋复杂化。陈纳德在美国正式参战以前即以志愿军身分来到中国，同蒋介石关系密切，是蒋的热心支持者。而对蒋来说，比起需把中国军队转用于缅甸作战的史迪威方案，他更喜欢不必动用中国军队的陈纳德的加强空军方案

史迪威同蒋介石的对立，由战略问题而发展至个人间的矛盾。史迪威逐渐开始批判国民政府的腐败，提出：为了有效地对日抗战，必须改革国民政府的军队，使用中共的军队。在中国战线由于日军的进攻而陷入危机的 1944 年 7 月，罗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 总统建议蒋介石把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史迪威。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对立因此而达到了顶点。结果，罗斯福接受蒋的要求，收回了自己的建议，解除了史迪威的职务。作为大战期间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转折点，这一事件具有重要意义。本章在此不再深入，详细请参照第二章。

大战期间的另一个对立，发生于美国驻华外交官和赫尔利大使之间。美国的战时对华政策，是确保中国继续抗战和在蒋介石国民政府领导下实现中国的统一然而，从 1943 年起，面对国民政府的衰弱、内战的危机和共产党解放区的发展这些现

实，美国人不能不重新考虑他们单方面援助国民政府的旧政策。常驻史迪威司令部的戴维斯（John P. Davies）、谢伟思（John S. Service）和卢登（Raymond L. Ludden）等外交官认为，照过去那样只是无条件地支持国民政府一方，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都是危险的；作为援助的条件，应要求国民政府通过实施改革而确保安定，避免内战；对于共产党，美国也应接近，以求达成国共协定，结成统一战线包括史迪威和高思（Clarence E. Gauss）大使在内，当时在中国的多数美国人，都承认这些外交官们所指出的事实，并在基本上支持他们所提出的建议。但是，1944年10月史迪威被免职，高思亦辞职。作为他们的后任，赫尔利大使和魏德迈中国战区（补1）司令来到中国。赫尔利虽然也主张达成国共协定，但认为美国只能支持与援助蒋介石一方，而不应同时援助共产党。因此他反对要求对国民政府施加压力的外交官们的路线

对中国形势的认识分歧，是造成上述对立的根源之一。外交官们从社会基础、党与民众的关系等观点分析国民党和共产党，认为国民党政府已失去民众的支持，自身亦缺乏改革的意志与能力；共产党的政权与军队则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经济上、政治上、社会上都比较安定。因此，他们预言：“国民党如果不和共产党一样实行政治经济改革……共产党将在几年之内成长为中国的支配性势力”（谢伟思1944年10月9日的报告）正是从上述认识和分析出发，他们主张：对国民党应施加压力，迫使其进行改革；对共产党则应给予援助，以把它争取到美国一边来。而且，从中共的民主性、民族性出发，他们认为这是有可能的。这些观点后来遭到了麦卡锡参议员等人的攻击。

比起外交官来，赫尔利高估国民党的实力和改革意志，而小看共产党的力量。并且，他认为，共产党对国民政府的反抗是以苏联的支持为后盾的，因此，要解决中共问题，同苏联的

交涉是最重要的。总之，外交官们是从国共两党与民众的关系这样一种观点分析问题，赫尔利则主要是企图通过大国之间的交易这样一种国际政治的手段来谋求解决所以，当苏联外长莫洛托夫（V. M. Molotov）在同赫尔利的会谈中否认苏联和中共的关系，称苏联乐于看到美国帮助中国问题得到民主的解决后，赫尔利十分重视。他以为它表明苏联已把中国问题委托给了美国，既然如此，只要中共知道自己得不到苏联的支持，就一定同意和国民政府妥协。据此他认为：即使目前国共交涉难获一致，只要等到中苏条约成立，共产党就会妥协。所以，他一边对中苏条约抱着一种期待感，一边主张美国应该只支持蒋政权，对共产党则仅仅保持接触而不予以援助。同时，他拒绝对蒋介石抱批判态度或提议援助共产党的外交官们的报告，认为他们背离美国政府的方针，是“不忠诚者”和“赤色分子”。结果，到 1945 年 4 月左右，同赫尔利意见相左的外交官们相继被调离。

二次大战期间在对华政策上虽然存在着上述两条路线的对立，但是，总的来说，无论是在驻华人员中，还是在国务院内，支持外交官主张的气氛都很强烈。

文献介绍

在论述包括上述对立问题在内的战时美国对华政策的著作中，菲斯（Herbert Feis）的 *China Tangle*（1953）（文献 1），史料丰富，叙述也较公正。其对象时期起自 1941 年末，止于 1945 年终马歇尔特使使华。

在陆军战史中，有洛麦纳斯（Charles F. Romanus）和桑达拉铎（Riley Sunderland）合著的关于中缅印战区的 3 册书（1952~1959）（文献 2、3、4）。需要指出的是，它们